

李涵秋 著
余涉 校注

活现形

——社会滑稽小说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活现形

——社会滑稽小说

李涵秋 著

余涉 校注

活 现 形

李涵秋 著

余 涉 校点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9.625 字数: 200千字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000册

*

ISBN 7—5378—0239—4

I·236 定价: 3.00元

责任编辑：王宇珍

装帧设计：郭璟瑛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社会滑稽小说。

本书以“五四”运动前后的历史为背景，以江南小镇为舞台，以三个不同家庭的遭际和青年男女爱情、婚姻纠葛为线索，展现了各种荒唐可笑的活剧，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、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，深刻揭示了清末民初政治腐败，知识分子寻求出路艰难的社会风貌。

前 言

《活现形》的作者李涵秋，是我国近、现代史上一位颇有影响的通俗小说作家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他的著作长期受到冷落。三中全会后，政策开放，北岳、江苏等几家出版社重新出版了他的长篇社会小说《广陵潮》。该书引起了读者的广泛重视和兴趣，这种现象说明，经过六十余年的风风雨雨，李涵秋的作品仍然有其不衰的生命力。

李涵秋生于1874年，祖籍安徽庐州，后迁居江苏扬州。祖父两代，都以经营烟草为业，家道小康。李7岁丧父，其后家境一落千丈，靠亲友接济为生。17岁时执教私塾，以维持一家生计。20岁中秀才，次年又成廪贡生。31岁时受聘前往湖北武昌坐馆教读，此时，加入文学社团“汉上消闲社”。37岁那年，因不满当时文坛和政界的黑暗和腐败，离武昌还乡。先后在两淮高等小学和两淮师范任教，到1920年整整从教三十年。李涵秋在任教的同时还从事小说创作。从1906年到1923年去世的十八年间，一共写了30部长篇小说，（合计不下千万字）其中大部分是社会小说。

在李涵秋创作的社会小说中，最能反映他的思想和艺术成就的，当然首推历时十二年成书洋洋百万言的《广陵潮》

而这部《活现形》，虽然篇幅不及《广陵潮》，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曲折，但它在保持和延伸《广陵潮》成就的同时，在不少方面又有新的发展具有新的特色。

因此，它是李涵秋后期创作中值得重视的一部小说。今天重新出版这部小说，对多侧面地了解和研究李涵秋的著作体系，是很有意义的。

一、《活现形》具有一定特色。

这部《活现形》小说是依据上海国华书局第四版版本校注。书中叙述“两对痴男怨女的历史轶事，受恶环境的引诱，遭旧社会的束缚，备尝艰辛，历尽苦难，卒成鸳侣之盟，终偕白头之约”。换句话说，这部小说着重描写青年男女之间卿卿我我的私情生活。事实上，正如这部小说的书名所揭示的那样，它的主题乃是揭露、鞭挞黑暗社会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。如果说，《广陵潮》“熔铸了从中法战争之后到‘五四’运动前夕这三十年的历史”，全方位抨击了这一时期的政治腐败和社会黑暗。那么《活现形》所揭露的“怪现状”，要相对地集中多了，不仅在时间上，局限于“五四”前后；而且它所揭露的对象，也麇聚在文化领域。当然，对于辛亥革命以后的政治状况，《活现形》不乏讽刺之笔，某些讽刺甚至是相当辛辣的。但是作者的这些揭露，只是在人物的谈吐中一带而过，并没有展开铺写，他的主要批判锋芒，还是针对当时文化界的各种丑类。

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，清朝这个封建大帝国再也无法“闭关自守”了，西方文化从此源源不断输入中国，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结构产生了强大的冲击。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中，在旧中国至少出现三种互相抗衡的社会力量：一种是革新的力量，出于救国救民的目的，积极主张输入西方文化，重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体系；另一种是守旧力量，为了维持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，顽固地抵制和反对西方的先进

文化，竭力要把源远流长的儒家正统文化保存下来，传之万代；还有一种是崇洋媚外的势力，即拜倒在洋人脚下，鼓吹“全盘西化”，充当可耻的洋奴角色。

《活现形》就是以“五四”运动前后掀起的各种思潮为背景，塑造了各色人物的生动形象，表明了作者在这场新思潮运动中的鲜明立场与爱憎。

程琢如是作者在《活现形》一书中着墨较多的人物。这个由于颟顸无能，终于罢官，以训蒙养家糊口的前任县知事，是一个典型的腐儒。他把孔孟的学说奉为不可易移的信条，开口“子曰”，闭口“诗云”，自称一生举动，“都从古书脱胎而来”，连怎么吃饭、睡觉也要从“四书”“五经”查一查“根据”。这样的人对西方文明（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）自然格格不入，因而把一切进步的文明措施，一概诋毁为“时髦恶习”，甚至对子女剪发这样的小事，也视为荒诞不经，远而避之。当西方的进步文化一旦触犯封建主义的伦理纲常，他更是如丧考妣，拼死攻讦，他反对儿子自由恋爱，他不许晚辈在交谈中称谓自己的名号，他更把妻妾当做奴仆一样差遣……总之，他竭力维护封建主义的“尊尊、卑卑，父父、子子”一套道德信条与等级观念。

时代毕竟不同了，倘若说《广陵潮》中何其甫的愚腐，主要表现在对业已“寿终正寝”的大清王朝的“愚忠”上，以至不惜以死相殉，演出了集体自杀的闹剧；那么程琢如的愚腐，则是更多地体现在对儒家正统文化，对封建主义伦礼道德的顽固捍卫，作者对这个人物采取严肃的批判态度，他在书中屡屡让这个高举儒家正统文化破旗，声嘶力竭叫嚷孔孟之道的道学家当场出丑。就是这个满口斯文，道貌岸然的圣

人之徒，在从滁县到杭州的途中，竟然面对美色，不能自恃，以至终于落入歹徒布下的色情圈套，最后被剥光了衣服，还丢失了戴在臂上的稀世奇宝赤龙玉镯。作者正是通过诸如此类的细节描写，深刻地鞭挞了道学家们的“被服儒雅，行若狗彘”的丑恶灵魂与伪善面目。

与程琢如相对应的，是刘亚华兄妹，窦习西和宋媛媛等人。这些人表面上似乎热烈拥护西方文明，但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他们吹捧西方文明，无非借此为自己的荒唐行径，涂上五彩斑斓的保护色。正如罗兰夫人所说：“自由，自由，多少罪恶借汝之名以行”。这些人正是在西方的“博爱”、“平等”、“自由”等等冠冕堂皇口号的掩盖下，干尽了伤天害理的坏事。刘亚华恬不知耻地声称自己先后与七八个男子姘居时，居然打出“男女平等”的旗号，说什么男子既然可以讨妾，女子为何不能多夫？”窦习西与表姐通奸，被人捉住以后，更是厚颜无耻地宣称：“恋爱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事，你若任意破坏，将来剥皮抽筋，定然免不了我们青年的屠戮”。

这些无耻之徒，如此篡改、歪曲西方先进文明，正为程琢如等守旧派提供攻击新文明的“炮弹”。程琢如就是抓住了他们的这些“把柄”唾沫四溅地谩骂新文明是“以讨父、仇父为道德，以滥赌狂淫为解放，以偷闲荡检为自由，以赌赂殴打为神圣”。因此这些人尽管打出的旗号多么时髦，实际上是守旧派抵制新文明的有力“同盟军”，只不过两者采取的形式、手段有所不同罢了！

作者对这些人物是彻底否定的，在书中对这些丑类的所言所行，进行了嘲弄、揶揄。并在小说的最后，为刘氏兄妹

安排了可悲的结局：家境破落，生活艰难，最后沦为靠乞讨为生的“浪子”！

书中被作者作为正面形象刻画的人物是鲍秋坪、殷花雨等。他们先后留学日本，从日本输入新式学科体育与音乐。在他们看来，“音乐是美学之一种，可以怡情，可以适性；体育可以强种，免蹈亡国之辙”。他们一面当教员，传播先进文化，培养后代；一面以自己的生活实践，抨击儒家的伦理道德，奉行女子独立，男女平等，自由恋爱，一夫一妻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正确主张。他们既不赞同程琢如的愚腐，更反对刘亚华兄妹的放荡，在旧中国，他们尤如处污泥而不染的两支白莲。

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的爱与憎，揭示了如何对待古文化和洋文化这样一个严肃的主题。

应当指出，正象许多民间通俗小说瑕瑜并存一样，这部小说在思想上也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缺陷，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便是突出的一点。也许作者被民国建立以后的虚假“成功”所迷惑，误以为当时留下的只是文化补课的问题。因而他笔下的鲍秋坪、殷花雨等人，并没有把整个社会的革命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内，只是着眼于不动摇现存文化体系的大框架下的小改小革。他们热衷办学，开设音乐、美术课程，举行女子剪发的集会等等，尽管他们把这些称为“轰轰烈烈的空前绝后的大举动”，但与《广陵潮》中的革命党人富玉鸾，为了推翻封建王朝，大义凛然，毅然献身相比，这样的愿望和理想未免太渺小了。

鲍秋坪、殷红雨一旦与落后、腐朽的文化力量交手，便迅速败下阵来。他们的那个被提到“妇女解放”高度上来宣

传的动员剪发集会，竟经不起刘亚华之类的社会渣滓的轻轻一击，殷花雨便一病不起，含恨去世。这是改良主义者不可避免的悲剧！

既然鲍秋坪、殷花雨如此软弱无力，不可依仗，为了惩罚刘亚华等无耻男女，作者不得不求援于宿命的因果报应的亡灵。刘亚华兄妹对自己的为非作歹，最后弄得一贫如洗，沦为娼妓、乞丐，曾作过这样的“反思”：“总怪我们老子在世时造出的罪孽，累得我们现在受罪”。用因果论来解释刘亚华兄妹的堕落下场，这就忽视了社会原因，放过了对社会制度溃疡面的讨伐和鞭挞。“改良”与“宿命”，在回避社会根本矛盾上是相通的，由前者转化为后者，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发展。在这里充分暴露了作者世界观的局限。

二、《活现形》的特色，其次表现在该书的艺术上。

从书名看，《活现形》显然是从清末的著名小说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、《官场现形记》演化而来。它继承了谴责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，对黑暗社会“揭发伏藏，显其隐蔽”，“命意在于匡世”。但是由于受到当时大量的西洋翻译小说的影响，在艺术格局上，与清代谴责小说迥然不同。《活现形》的整体结构，不再象谴责小说那样，“头绪既繁，脚色复伙”，而是有一个完整的故事，几个主要人物，贯彻全书的始终。至于“对话作用的提高，大段的心理描写，生活场景的撷取，插叙补叙的运用”等等都显示了《活现形》比一般谴责小说高出一筹。尤其在人物的刻画上，《活现形》没有坠入谴责小说的俗套，而是把人物置于生活的矛盾、冲突之中，渐进式地多侧面地加以刻画，在一定程度上

表现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来。程琢如这个人物形象就不是平面的，而是立体的：愚腐中有坦实，守旧中有憨直。袁璧珠、程春娇、殷花雨虽然都是善良、美貌的女性，年龄相仿，志趣相同，然而她们同中有异，袁的天真幼稚，殷的泼辣大胆，程的世故老练，各呈异采，不容混淆。

作者正是通过这样的描写手法，使书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，丰富多采。这又是比谴责小说高明的地方。《活现形》这一可贵的尝试，给当时中国小说带来清新的气息。

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，《活现形》是被称之为滑稽的社会小说。“滑稽”作为一种审美范畴，这个词汇确实捕捉、概括了《活现形》创作方法上的一个特色。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：“当丑自炫为美的时候，就变为滑稽”。生活中丑恶事物的实际内容和外在形式，往往是矛盾的，对立的，正象（德）里普斯《论喜剧》所说的那样：它们“常常是这样的一种小，即装成大，吹成大，扮演大，却仍然是一种小，一种相对的无。”李涵秋在《活现形》中，善于通过艺术夸张，把各种反面人物的言与行，表与里，名与实等等方面的“大”与“小”的矛盾揭示出来，产生了滑稽可笑的效果。除了前面说到的程琢如、刘亚华之外，全书还有很多这样的描写。卢新翰的五姨太月红，以“男女授受不亲”为借口，反对青年男女的正常往来，而自己却和慧和尚勾搭成奸，以至最后挟资私奔。曾因犯诈骗罪锒铛入狱的无赖窦习西，竟靠着裙带关系，当起省议员的私人秘书，居然西装革履，还哼哼唧唧高吟狗屁不通的艳诗，炫耀于人。不学无术的文痞萨绿燕，为了骗得几文稿费，竟然冒充女性，取名“红莺女史”，频频写稿，博得报人垂青，……如此等等。作者对现

实生活中的丑恶事物，给以夸张、荒诞的表现，把他们的装腔作势，忸怩作态以及愚蠢、虚弱的情态，公之于众，剥光了这些丑恶人物的“大”的外衣，把他们的渺小本质暴露无遗，使人们在笑声中彻底否定他们。著名小说家莫里哀说过：“恶习变成人人的笑柄，对恶习就是重大致命的打击”。对丑恶现象，丑恶人物的滑稽描写，引起人们对它的嘲笑，有时比直接的、愤怒的批判更有力量！

当然，滑稽毕竟不是油滑、打诨。即是把丑恶人物的可笑、可恶、可鄙揭露出来，在笑声中告诉人们关于这样人物丑恶本质的真理。但作者在这部小说中的某些描写，也不无油滑、打诨之处。如第一回玉婆式人物徐妈，在卢新翰家吃汤团被咽，人事不省，后用火筒将汤团吹落，使她起死回生；第十回程琢如参加杜荫堂为他举办的欢迎宴会，由于遭到窦习西的暗算，误食巴豆霜，结果接连矢气、腹泻，当场出丑。这两段描写篇幅都很长，具体而微，有没有这个必要呢？人们读了这段描写，除了哈哈一笑之外，还留下什么更多的东西呢！类似的描写，书中还有不少。这些近乎打诨、油滑的描写，为笑而笑，以笑的形式，冲淡了人们对丑恶事物的憎恶，就不免堕入了“恶趣”，显然是我们所不取的。

三、关于对通俗小说的评价：

在二十年代初期，文学界对当时颇为流行的所谓“鸳鸯蝴蝶派”小说，曾经有过一次比较集中的猛烈的批判。批判者尖锐地指出了这批小说是“趣味主义”，是“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”，是文学史上的一股“逆流”……连前期的徐枕亚的《玉梨魂》和后期的张恨水的《啼笑姻缘》，都袭用了这个评价。

这场批判对提高广大读者的鉴赏水平，教育当时的通俗小说作家，扩展新文学地盘，曾经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。但是无可否认，批判中也出现过“给婴儿洗澡，连脏水和婴儿一起倒掉”的“误伤”现象。凡事应当作具体分析，正如刊载于反动报刊的文章不一定是反动作品一样，在鸳蝴派控制的报刊上发表的东西，也不一定是淫秽、猎奇、风花雪月之作。在此类通俗小说中，不乏宣传爱国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；讽刺某些社会丑恶现象，宣扬改良主义；以及同情与描写底层人民悲惨生活的比较严肃的篇什，尽管他们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不少缺点，但毕竟对当时社会起过积极的作用。象前面提到的《玉梨魂》，强烈反对封建婚姻观念；《啼笑姻缘》也深刻揭露了反动军阀的罪行，能说这些作品对抨击当时那个黑暗的社会毫无积极意义？所以把它们与那些低级庸俗的作品，笼统斥之为“文坛的逆流”，显然是不公允的。对李涵秋的《广陵潮》和这一部《活现形》也要作如是观，在看到它的不足的同时，应当肯定它的成就和作用。

在这里有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，即对“趣味主义”应当怎么看？这是当时批判这批通俗小说的一条主要罪状。由于中国文坛长期受“文以载道”的儒家传统观念的影响，对文学功能作狭隘的片面的理解，把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训诫的工具，常常置趣味于不顾；至多也只是将趣味视为一种观念的载体，所谓“寓教于乐”便是。其实，文学作品不应排斥娱乐性、趣味性。恰恰相反，给人以艺术情趣，正是文学艺术社会功能之一。无产阶级文学先驱鲁迅，对三十年代受“左”的文艺思潮的影响，讳言文学的趣味性，早有异议。在《集外集·〈奔流〉》编校后记中，就明确指出：“说到

‘趣味’。现在确已算一种罪名了，但无论人类的也罢，阶级的也罢，我还希望总有一天弛禁，讲文艺不必定要‘没趣味’”，这就是说，追求趣味性，是昨天、今天和明天一切文学艺术家应当遵循的美感规律。

看来，问题不在于有无趣味，而在于趣味的内容，倘若文学作品的趣味，能给人健康向上和美的享受这正是我们所应当努力提倡的。

基于以上道理，把《活现形》采用滑稽手法所产生的艺术效果，与趣味主义画上等号，至少是不确切的。《活现形》通过滑稽手法，揭露与鞭挞了丑恶事物，使人们在兴味盎然中认识这些事物的本质，受到教育，得到启迪，这有什么不好！我们并不否认李涵秋小说《活现形》有“趣味主义”的描写，那只是指其局部；如果以此概括它的全部和总体，并以此否定整个小说，则未免以偏概全，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。

四、为了方便读者阅读，这次重版我们遵循了以下几个原则作了校注。

（一）原版用繁体字，不分段落，不加标点，异体字和同义词很多。同时由于排字校对的粗疏，错舛之处甚多。此次，我们除了对错舛之处一一加以校勘订正之外，还将底本中的繁体字改为简体字，对异体字、同义词尽量予以统一并根据内容划分了段落，加上新式的标点符号。

（二）书中用典不少，特别在写到腐儒程琢如的对话时，更是长篇累牍的典故；同时由于作者是扬州人，故事又发生在沪、杭一带，因此书中也出现了不少吴语。我们对书中难懂的典故、吴语等，作了简要的注释。

(三) 书中所用代词、虚词，凡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的（如“他”字的不区分性别；“的”、“地”、“得”的交替乱用等），一律加以订正。

(四) 对原书的语言结构、习惯用语，一般不作改动。

书中如有不妥之处，谨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1987年9月于顶天楼

第一回

燕语莺啼三姨缱绻
花团锦簇小侣缠绵

